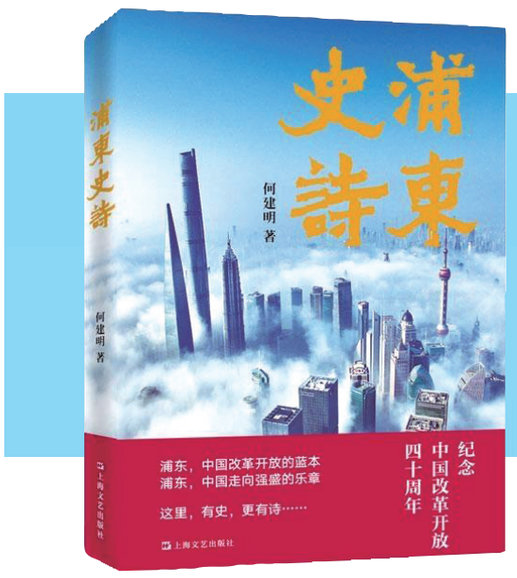
■新作聚焦

何建明报告文学《浦东史诗》：为梦想和奇迹立传

□彭　程



《浦东史诗》中，历史的舞台上是人的身影，故事的进行中有情感的流淌。一种被理性观照的情感，一种被激情灌注的理性，经由美的表达而让读者感动和沉思，也赋予了这部作品一种既弘阔激昂又凝重笃实的品质。

对一位密切关注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一种迅疾变动中的生活，显然最容易吸引他的目光。尤其当这种生活既具有巨大的体量，也饱含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又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时，就更是如此。但同时，他无疑也会面对一个挑战——要成功地书写这一切，需要更为宏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需要理性和情感的双重烛照等等。这是题材的特殊性对于写作者的更高要求。何建明的新作《浦东史诗》便是一部充分体现了这种品质的极具力度的作品。这部40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文字间也仿佛折射出了他所描绘的浦东新区的气息和节奏。你分明读到一种匆促的足音，一种磅礴的气势，一种生命激情的不竭的喷涌，一种炽热梦想的连续的展开。

《浦东史诗》问世之时，恰逢举国上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作品因此也被赋予了一重特殊的意义。浦东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验田。因此，浦东的开放开发，不但对于上海的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对于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也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浦东的每一个探索、每一次突破，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印，一项项改革措施从这里复制推广到全国。正因为如此，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浦东，从它的现状和走向，观察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趋势，衡量和预测所达到的现实效果和未来远景。因此，用文学的形式全面展现浦东开放开发的历程，深入发掘其中蕴含的精神启示，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浦东史诗》勇敢地担当了这一使命，并交出了一份不俗的答卷。作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诸多方面，全景式地再现了浦东开发的波澜壮阔的历程，仿佛在读者眼前展开了一幅巨型的画卷。从经济领域的大幅度改革，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到综合配套改革的全新探索，实施制度创新，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这一系列的重大举措，作品中都有着清晰而充分的描绘。从纵向的时间脉络中，我们看到了可歌可泣的历史进程如何一步步地展开，从横向的人物、故事和场景中，我们看到了梦想、激情和奋斗的动人的表现，既有令整个世界惊叹不已的辉煌事功，也有创造了这一切的人的力量。正是在二者的连接交织中，看到了“史”与“诗”的结合，看到了作者用文学为一项注定要铭刻在史册上的伟大壮举立传的雄心。

作品一开始，作者就通过亲身的经历，写出了大上海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的破败和窘困，读来令人有不堪回首之感。因为家里住房狭窄，谈恋爱的年轻人只能到外滩，一对挨一对地靠在水泥防汛墙栏杆上，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人墙；作者当兵时从上海换车回常熟老家，如今高速公路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时弄不好可能会走上两天。这些情节，鲜明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乱、挤、脏”的城市面貌。对于本书所要表达的主题，它们也是重要的铺垫，揭示了上海挣脱沉沦走向腾飞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而浦东这一片黄浦江对岸的当时还是十分荒凉的土地，正寄托了让这座曾经被誉为“东方王子”的城市浴火重生的伟大梦想。

但梦想和现实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只有靠不懈的奋斗连接和弥合。作品对浦东开发的历程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概括，主次分明，详略得当，举凡重要的事件和环节，都获得了笔力酣畅的描绘。从1990年春天邓小平一锤定音拍板“浦东开发开放”，到前后几任上海市领导人围绕这一目标全力以赴殚精竭虑；从开始时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三通一平”、招商引资、在一张白纸上勾勒最初的线条，到持续多年的高歌猛进，各项事业和产业的规模层次都得到飞速提升……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凤凰涅槃般的传奇巨变，一种超越常规的发展和腾飞，一种令世界为之瞩目的辉煌成就，随着纸页的翻动，在阅读者面前清晰地展开，令人激动不已，浮想联翩。

文学的最为本质的魅力，就在于以情动人。这部作品浓墨重彩地展示了参与建设浦东新区的决策者、领导者、投资者、劳动者和各个方面的人们的情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是统驭和贯穿全书的灵魂和主线。它既是个体的，更是群体的。作者的刻画可谓是生动传神。它通过具体的情节、细节和场景，描绘出了人物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境界。1991年和1992年春节期间，邓小平都来到刚修建好的南浦大桥，眺望建设中的浦东，两次都问起这座桥是否世界最大，得知不是时，不再说话。1993年冬天，他登上了杨浦大桥问起同样问题，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非常激动，立即紧握大桥建设总指挥的手表示感谢，并即兴吟诗。邓小平一向严谨沉默，喜怒不露于声色，这样不同寻常的表现，显然是他内心激情的流露。浦东新区第一位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则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外露的人，书中数次写到他按捺不住地流泪，或者因为看到百姓们的生活环境艰苦而难过自责，或者因为一颗赤子之心不被理解反受斥责而备感委屈，或者是因为一个重大项目开工上马而满足快慰。

在他们的激情、智慧和奋斗的后面，是一个民族奋进腾飞、富足强盛的强烈愿望。浦东的骄人成就，上海的重新崛起，凭借的正是这种愿望的巨大推力。无数建设者们的情感的喷涌和交融，转化生成为一种浦东精神。这部作品深入揭示了浦东精神的诸多方面。其核心之所在、本质之所系，便是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纵观浦东的发展历程，一个最突出的声音，就是以敢于“吃螃蟹”、敢为天下先的胸怀和气魄，不断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规旧习，吸收和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如在浦东开发之初，日本百货巨头八佰伴前来考察，表示愿与上海第一百货合作。当时这种中外合资企业形式没有先例，也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新区的领导者们冒着政治风险，经历了种种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为其争取到了一张“出生证”，而这也正可以看作是此后浦东一系列招商引资壮举的滥觞。

作品中对城市名字的解读，独出机杼而又意味深长：“上海”二字，其实从来就是一个“动词”、一种“状态”、一种“精神”。正是凭借这样一种不断追求梦想的状态和精神，浦东这一片原本荒凉贫瘠的土地，被开垦培育成为一处硕果累累的人间奇境，凝聚了世人的目光。浦东的成功，再造了上海的辉煌，更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量的有力佐证。

这种精神不但体现在浦东的建设者们身上，也通过他们的创造物而获得了折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标性建筑物，它们是城市的精神气质的标志，是城市的深层蕴涵的外在表征。艾斐尔铁塔之于巴黎、金门大桥之于旧金山、大歌剧院之于悉尼，都是如此。这部作品也写了若干个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从最初的东方明珠塔，到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再到高达632米的上海中心，这些一个比一个更高、更现代化智能化的建筑，也分明是在隐喻着上海的不懈的进取和不断超越。这些令人目眩的高度，不仅仅是属于可衡量的外部物理层面上的，也是属于可感知的内在精神层面上的。

在《浦东史诗》中，史与诗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了结合——历史的舞台上是人的身影，故事的进行中有情感的流淌。一种被理性观照的情感，一种被激情灌注的理性，经由美的表达而让读者感动和沉思，也赋予了这部作品一种既弘阔激昂又凝重笃实的品质。

为了写作这部《浦东史诗》，作者深入浦东建设现场，采访了上百位浦东开发开放的参与者，查阅了大量资料，这些勤奋扎实的工作，为作品的厚实、饱满和鲜活奠定了基础。这再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只有置身于火热的生活第一线，才有望聆听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才可能写出揭示和表达时代的精神本质的作品。生活海洋中的丰富宝藏，总是馈赠给那些热爱和追求它们的人。

■关　注

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和成熟

——以孟繁华为例，或因孟繁华引出的话题

□谢　冕

所谓新学科指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上世纪50年代，它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光明的尾巴”。我上大学的时候，现代文学讲到赵树理，几乎就没什么可讲了，于是往往在学期的最后，匆匆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新作品交代一过，就收场了。这也正常，毕竟刚进入新的时代，一切刚开始，新的文学现象（即所谓“光明”）还来不及展开。

过一段时间，新的作品逐渐多了，随之而来的批判式的评论也多了。那些批判者往往自己是专业的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姿态“居高临下”，文风也相当粗粝，给人的印象并不佳。于是，这个刚出头的新学科，也普遍不被看好，学科未曾形成，“没有学问”的判词倒是有了。在大学中文系，最有“学问”的是古代文学，再就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谁都可以做的，既然不被看好，这“光明的尾巴”也就这么拖着。

北大是最早建立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学校。我和洪子诚先生参加了初建工作，我们知道此中甘苦，我们的工作那时也不被重视，但我们坚持下来了，新建立的教研室开始编写新中国的第一本当代文学史，即《当代文学概观》。在当时的大形势下，这个学科风险不断。记得那年工农兵大学生进校，一个学生有意“考我”，题目是：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禁区？我只是支吾其词。幸好时风有变，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给予我们较多的言说自由。这些年，个人文学史、文体史、个人文集的出版也都得到允许。当代文学不仅有硕士学位，而且一些大学也开始设博士点，从这里走出来一批又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这些青年才俊是支撑这个学科的骨干。因为与社会政治的距离太近，这里依然充满险情。

但毕竟有勇者前行，有智者带领我们一路坚持。如今这个学科有无“学问”，它的学术含量和地位，应当是不被怀疑了。我们终于因自信而自重，因自重而自立，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曾经被轻视的“没有学问”的新学科走向成熟。

至于我个人，除去上述那些外在因素，使自己有时不免处境艰难之外，就学科自身而言，因为毕生从事于此，深知其中坎坷曲折，也时感从事之难。首先，这是一门不断增生和增长的学科，它只有起点而不知下限，作为研究对象，它是不断前行的、动态的学科。作品时刻涌现，资料浩如烟海，新人辈出，凡此一切，我们必须奋力跟踪追赶，无休无止。过去大批判时，我们嘲笑一些老师“发黄的讲稿”，如今我们甚至羡慕他。从事当代文学的教学，我们几乎每一次讲课都需要新的讲稿，补充、更新，甚至推翻重来，这是常态。

从事这个学科的学人，大抵都深感负荷的沉重，纷至沓来的作品需要了解，阅读量极大。而刊物和会议的繁多，呼唤着批评家的介入，写作量极大。众人皆知，有效的文学批评是建立在文本的阅读基础上的。我常告诫学生，没有阅读和思考，一个字都不要说，这是作为学者的基本和出发点。我们读过，我们才能批评一个作品。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走向进行概括，一个评论家的概括能力，往往能说明一个评论家所处的位置。

“积学”二字，在此当作别解。面对不断增长的研究对象，说来很是不忍。我们必须迅疾地淘汰那些平庸的作品，经过筛选，保留下来那些精品，而后予以归纳、总结。通常讲积学，是积累，而在本学科，却是首重淘汰。而千变万化的当代文学实践，其中的诡秘和奇异也是一种常态。作为批评家的学者，让那些奇珍在我们的眼皮下消失，却是不可原谅的失职。这里强调的是准确的判断，是学者的眼光，学识决定眼光，眼光决定概括力、判断力。最终体现为学者的胸怀，胸怀宽广，境界就高。一个学者能从异常多变而繁复的现象中有自己的发现，乃是学界所至，而又能从通常视为平常中发现不平常，则取决于胸襟，即境界。大学者有大境界。

“众神狂欢”也好，“青春文学和失去青春的文学”也好，“乡村文明的追怀和崩溃”也好，“先锋文学的终结”也好，都是批评家对于一个时代性的文学概括。目光所至，怦然心动，其间燃烧着学者的激情。激情在诗人那里是“常有”，而对于批评家和学者而言，却是“罕有”。我经常强调从事文学研究的激情，甚至强调以美文体现这种激情。而判断力、眼光、境界，那是来自于学科的观察和积累，此非一日之功，乃是长期坚持之功，而作为学者的激情却是由于热爱。

一个新生的学科，就在这样的丛莽中诞生并生长，而作为标志的并不是那些大本小本的著作，而是一代学人的出现，他们有异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是受到严格训练并熟谙专业知识的全新的一代人。他们是学者型的批评家，又是批评家型的学者。一代新学人的出现和他们成为当今学界和批评界的主力，正是中国文学作为学科成熟的一种标志。

■新作快评　李凤群长篇小说《大野》，《人民文学》2018年第10期

对话与相遇

□顾奕俊

写作《大野》的李凤群显然是有其“野心”的。将这种“野心”摊揉开，能够非常明晰地区分出两类女性肖像：“故乡事”的今宝与“江湖情”的在桃，以及由之形成的角色互补与结构对称。

坦率地讲，《大野》里，无论是“奇数章”的“今宝的故事”，抑或是“偶数章”的“在桃的故事”，在情节安排、观念表述等方面都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李凤群有意识地将“今宝的故事”和“在桃的故事”进行交错并置，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潜在的对话形式。

所谓的对话形式，首先指向今宝与在桃之间的电子邮件联系，这也是“在桃的故事”的文本呈现形式。在桃承担了信息发起、信息传递的角色职责，她频繁地向一个沉默却又多思的同龄人述说着那些尚未被对方触碰到的“异乡”经验；困居一隅的今宝是单向度的信息接受者，但同时她参照在桃略显语无伦次的私人经验，逐渐加深了对自身所处地域环境的否定态度，并最终以“娜拉”式的决绝作出了反馈。

今宝的出走与在桃的回归，使得叙事结构呈现出回环趋势。今宝、在桃的人生并没有因为叙事时间的终结而终结，相反，她们在互换守望者、行动者的角色后，获得了介入另一种生活情境的契机。

今宝与在桃的第二层对话形式，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丧父的今宝与失母的在桃，从少女时期就受到来自外界的误解、歧视。今宝对外部社会的憧憬，是在桃习以为常的过往经历；在桃最终归返的故乡生活，恰恰成为今宝意欲逃离的根源所在。她们实践着由作者设置的截然相反的人生方案，同时也构成一种想象性对话。

在桃写给今宝的电子邮件，其实是在间接诱导后者对于未知的空间维度作出带有预设性质的“景象构建”。但充满悖论意味的是，在桃一方面为今宝提供“景象构建”的想象资源，另一方面，又在亲历后确认了构建资源的不可靠性。

小说《大野》里，今宝的无奈在于“景象构建”难以真正实现，在桃的烦恼在于幻灭过程中不得不接受现实世界接二连三的伤害。将两人各自的无奈与烦恼进行交叠，可以发现，今宝与在桃之间的对话，本质上是场存在“时间差”的对话：终日为家庭琐事纠葛的今宝深陷于“此处”的泥淖。故而在桃向今宝讲述亲身遭遇的同时，也在无形间召唤出了一个“迟到的在桃”。而在桃的困境则源自她发觉了“彼岸”背后的不堪。对于“本体”的“勘破”又让在桃意识到最初的“此处”早已转变为遥远的“彼岸”，这就如同她在认清南之翔真实面目以后的复杂心理：“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我从没有停止哭泣。”换句话来讲，多层次的“对话”形式，并没有让今宝与在桃在精神层面达成对等的互动。她们不断波动的内心情感，事实上难以被对方理解，更不用说接纳了。假如女性因另一方的多舛命运而有所触动的话，真正触动她们的其实是不幸者身上那个或相似或相反的自己。

《大野》以今宝与在桃的不期而遇收尾。然而需要注意，结尾处的相遇情节其实发生在两人形成对话之前，且这次打破线性时间结构的不期而遇也成为在桃写信给今宝的动因所在。今宝出走时告知其丈夫的理由是去普济圩农场“参加和在桃的一场谈话”，但今宝、在桃两人首次相遇的相关表述，已然判定了今宝出走理由的不成立。“今宝会去哪里？”这是两种相悖叙述的交错中陡然生出的疑问。今宝的去向无从得知，却又不言自明。而不言自明背后所设的那种遥知未来边界的必然逻辑，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尽管今宝与在桃不再会“会面”，但或许因此，她们在精神层面才真正具备了再次“相遇”的可能。

■评　论

家乡，何以成为精神家园？

——《庄河记忆》的文化启示　□李小江

所谓“精神家园”，不同于地理意义上的家乡，它落实的不止是一方水土之上建构起来的风土人情，还有回归的意念；无论身在何方，让心灵承载着温暖的记忆，在“诗意的安居”之地落脚还乡。可是，这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一生未曾离乡也不思远行，或者在短暂的出走后毅然转身回乡。无论身在哪里，他们始终苦苦地眷恋着生养之地；一旦返乡，便将全部身心凝结于“一方水土”不弃不离。因了他们的努力，原本由历代官府经办的方志书写脱离了迂腐的庙堂气息，在民间沃土中极大地扩展了它的精神疆域。

庄河地区原称红崖，庄河地名起于明朝，启用于清朝末年1906年，地偏人稀，长久被视为化外之地。庄河的处境因此难堪：生养众生的一方水土与人们身边的人情世故似乎不那么搭界；在身份迷失和无根可寻的茫然中，一切事物的人文价值都显得轻薄，尽其自生自灭，任人遗忘，直到《庄河记忆》诞生。

《庄河记忆》于2012年春正式创刊，酝酿筹办的日子由来已久。最初，它只是一些个人的散念，经历漫长的艰苦创业，日子日见富足了就想经营一间自得其乐的书屋，于纷繁世界中找到精神寄托。

几年下来，《庄河记忆》为庄河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但凡在“庄河”名下出场的文字，根性外露，不管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札记和随笔，无一不携带着脚下泥土的气息。这些贴近大地的笔触，或抒情抒怀，或写实纪实，将心绪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幅幅有温度也有深度的地方画卷，共同为庄河创造精神财富。

坚守民间立场，突出生民文化，《庄河记忆》中有两个栏目不同寻常：“岁月口述”和“民间拾萃”。前者以人为主体，站在史学高度，将有迹可循的生命故事与宏观的大历史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个人”在芸芸众生中自我呈现，展示出万千气象。

重塑方志，《庄河记忆》是从“正名”开始的。庄河的历史河道难以疏通，首要问题是“名”的混乱。关外边地，常常是多民族交汇共生，地名之杂乱，不仅与民族混居和多民族语言的交流有关，也与中央政权的盛衰集散呈负相关性。毫无疑问，像庄河这样的边僻之地，倘若没有以生存为本的生民文化，庄河人的记忆就没有依托，无根可寻。生民文化的遗存可见各种维系生存的老物件，其精髓却并不是衣食住行本身，而是一方水土之上的主人即风土人情的引领者：大家族——方志中，可与正史中帝王将相比肩的，是地方望族和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员和文化名人。

因此，搜寻家族历史日渐成为《庄河记忆》的重头戏，在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另辟蹊径。大家族的庄园遗址和家谱族谱由此更加弥足珍贵，成为可说可见可以追寻的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征集有赖于地方“志人”的自觉投入。

《庄河记忆》以身说法，准确而全面地展示了它的内核：自我求证，自在自由。发刊6年多来，这份在夹缝中茁壮生长的民间刊物，通过不同形式展现民间精神特有的精髓：草根性、自发性、多样性。说到底，民间精神即草根精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与主流与庙堂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它在根性上追寻阳光，却在阳光不到之地仍然能够顽强地生长。

《庄河记忆》创刊不久，即以“民间精神”为题主办了一个乡镇专刊“青堆子专题”。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青堆子是庄河的经济、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青堆子是一个关乎精神归属和心灵家园的文化符号”。庄河女儿孙惠芬生于青堆子，离乡出走之后，她以故乡为名用写作的方式在精神上还乡，不仅成为《庄河记忆》有力的支持者，也是“记忆”最忠实的承载者。无论她身在何方走出多远，萦绕在怀的，“总是那些厮守家园的青堆人，默默而执拗地坚守着他们至珍至重的文化形态，虽寂寂无名亦终生不悔”。

因了这种精神，《庄河记忆》有根性，也有滋养枝叶繁茂的土壤，可以一直“就这么走下去”。它知道，这条路“未必通天，但一定会寻获一个水草丰美的好去处”。它坦言，这种执拗的精神追求并非来自高尚情怀，而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里摸爬滚打之后感受到的一种缺失”。借用一位本土作者的比喻，“我们所有人可能都是候鸟，为着各种各样寻觅家园的理由，一生往复翻飞，从生到死……所有的折腾，都为着灵魂的从容安放”。

就像庄稼的生长需要充足的养分，一个人的人生——无论其身份地位民族种族——不仅需要阅历和远行，也需要根植大地的底气与安然。它相信，只要脚下的土地安然无恙，《庄河记忆》就会如那些庄稼一样，携带着浓厚的“土气”一茬一茬地生长和成熟，给人温饱，也给人慰藉。